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陈平原 主编

从『承启之志』
到『守待之心』

梁启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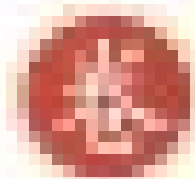
魏 泉 考 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卷



梁启超





到『守待之心』

从『承启之志』

梁启超

卷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陈平原 主编
◎梁启超卷 从『承启之志』到『守待之心』

魏
泉
考
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 从“承启之志”到“守待之心” / 魏泉考释.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7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 陈平原主编)
ISBN 7-5329-2601-X

I. 梁… II. 魏… III. 梁启超 (1873~1929) —
演说—选集 IV. B25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6793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965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 8.625 插页 / 1 千字 / 192
定 价	21.00 元

总序

陈平原

按使用的功能，晚清以降的“演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二是文化传播与学术普及。前一类声名显赫，后一类影响深远；与学界同行的思路不太一样，我更关注后一种演说，因其与现代中国学术及文章的变革生命攸关。至于与“演说”三足鼎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报章书局的大量涌现，使得学者们很少只是“笔耕不辍”，其“口说”多少都在媒体或文集中留下了痕迹。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演说”，成了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生活与学问的最佳途径。于是，我决定选择章太炎、梁启超等数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演说”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与表达。演讲者“说什么”固然重要，可我更关注其“怎样说”——包括演说的姿态、现场的氛围、听众的反应、传播的途径，还有日后的“无尽遐思”等。换句话说，我希望兼及“演说”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关系密切，这点我很早就意识到，只是一直犹豫不决，到底

……1……

该从新式学堂的演讲课程入手,还是专注于某些著名学者的学问人生,抑或着重考察其与文体变迁的关系。1999年春,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我构思了《“雄辩会”与“讲演团”——兼及“五四”青年的文化姿态与思维方式》一文,可惜半途而废,只留下“五彩缤纷”的论文提要和一地散钱。而从谈论章太炎避难东京时如何将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欲望,在“讲学”中借助各种穿插,表达得淋漓尽致^①,到描述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怎样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②;再到辨析鲁迅和胡适各自的述学文体与演讲活动的关系^③,以及综合考察性质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代中国文章变革》^④,我主要探讨的是: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一是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

① 参见《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载《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第1—52页;此文修改后,成为拙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四章。

② 参见《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此文摘要刊2002年5月31日《文汇报》,全文刊《现代中国》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并收入拙著《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③ 参见《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胡适的述学文体》,《学术月刊》2002年第7、8期。

④ 本文曾于2005年4月28日在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2006年1月2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举行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有几点必须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①；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章太炎等人的讲学，与宋明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基本上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第五，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绝对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演说”；学者之公开讲演并刊行讲稿，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第六，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②；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

以上简要的叙述，大致涵盖我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及文章变革所做的探索。区区论说，不如意处仍多多。恰好，我的

①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②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几位学生对此话题也有浓厚的兴趣，于是组织他们，选择各自熟悉且欣赏的对象，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之所以选择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陶行知（1891-1946）、朱自清（1898-1948）、闻一多（1899-1946）等八位作为考察对象，首先基于其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或文化名人，或学界领袖，此八人全都身负重任，一言九鼎。“演说”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演说者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声誉有很高的要求。同样一句话，不同身份的人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听众之所以动不动“大拍掌”，很大程度基于对演说者的崇敬以及“前理解”。除了个人魅力，论题的选择，同样十分重要。上述诸君演说的重点，在思想文化，而不是政治动员。如蔡元培之谈论大学意义，章太炎之主张以史救弊，还有陶行知之演讲生活教育之路以及朱自清的解说诗文意蕴等，时至今日，仍有其独特魅力。

其次，还得考虑演说者的口头表达能力。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一场主宾皆大欢喜的讲演，抽离特定时空，很可能不知所云。相反，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大听众。讲演者的姿态以及讲演时的技巧，同样影响到演说的成败。不同于专业著述的条分缕析，讲演必须突出大思路，而且讲求幽默，语出惊人，这样，才能让现场的听众不断地“拍掌”、“大拍掌”。而这，并非自然而然达成的，很可能是现代学校训练的结果。闻一多在清华、朱自清在北大、陶行知在金陵大学，都曾受过专门的演说训练。当然，最著名的还属胡适的故事——1912年夏天，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修“一门极有趣的课程”，那就是训练演讲，此后，“这一兴趣对我

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①。并非每个人都像胡适那样，对演说保持持之以恆的兴趣。比如，闻一多就曾对清华的演说课程提出过批评，可最后时刻挥洒自如的绝佳表现，其实得益于其早年训练。至于鲁迅称“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②，那是作者过谦之词；据许多听众回忆，鲁迅演说时思路之奇崛、语言之幽默，让人叹为观止。能演说，有深度，论题重要，且讲稿保留下来，这样“四美兼具”的大好事，并非俯拾皆是。

再次，“演说”与“文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问须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所有这些，决定了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的撰述，虽有“大体”，却无“定体”，往往随局势、论题、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但另一方面，演说与演说者的人格、趣味以及文章体式，又是密切相关的。闻一多与朱自清性格不同，在演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春风化雨，一雷霆万钧；西南联大师生回忆这两人的讲课、演说以及生活逸事时，三者之间往往能够互相印证。至于胡适与鲁迅，演说一如其文章，或文化立场坚定，高等常识丰富，清朗而畅达；或自我质疑，迂回前进，千里走单骑。当然，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演说与文章，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最后，该说到本丛书的最大愿望，那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演说现场”。严格说来，所有的演讲纪录稿，都很难准确传达演说者的真实意图。章太炎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而弟子沈延国更是将传世的章氏讲演记录分为五类，称只有那些师“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者，方能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用^③。至于鲁迅，更是清醒地意

①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58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第392—39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识到此中陷阱。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①,或因与相关文章重复^②。若只是孤零零的文本,那些偶然留传下来的“演说”,自然是不尽如人意。因为,专著能够深入,教科书讲究条理,文章可以反复琢磨,演讲则追求现场效果。单纯的演说,确实不及专著或文章精深;但如果添上相关史料的考辨,使“演说现场”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原,那意义可就非同一般了。

单是阅读记录稿,你很可能觉得,绝大多数演说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本丛书的操作,与一般意义上的“考辨”略有不同,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众、论题,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只能留待读者评判了。

2006年4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① 在《〈集外集〉序言》中,鲁迅称:“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

② 参见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导 言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在19、20世纪经历了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转型。过渡时代，气象万千，“实千古豪杰之大舞台也”。^①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本文以梁启超为例，分析其后期思想的转变背后所流露出来的在近现代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态，希望在发掘梁启超不同于时流的文化心态与爱国幽怀的同时，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晚年心态”这种文化现象中耐人寻味的人文蕴涵，也能稍有揭示。

一

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提倡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西方思想文化与政治学说，思想为之一变。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致力于“起民权移旧俗”的国民启蒙宣传，其“别具魔力”的文字、深切敏锐的言论，不仅使他赢得“舆论界之骄子”的美誉，也使他在思想文化界成为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影响了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在内的其后几代知识分子。曾有论者指出：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是一个要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中，梁启超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71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①

不过，作为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早期以“新民说”为中心的思想启蒙和舆论宣传中，对于时人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其对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而在于他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提倡、对改革中国社会现实的呼吁以及一系列冠以“革命”之名的文学改良主张，诸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界革命”等等。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梁启超笔锋所至，总能令无数青年人闻风兴起，热血沸腾。

1912年民国建立后，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投身于现实政治，希望有机会实践他以往的宪政主张。但几经周折，最终还是宿愿难酬，不得不黯然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游历欧洲，为时一年有余。这次欧游的经历，使梁启超的思想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战后欧洲的所见所闻，让梁启超开始反思欧洲科学文明的局限，并转而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足以对西方文明之症的良药。因此，这位早年热心于以报章文体输入西学的“中国之新民”，晚年却转向提倡东方价值观，致力于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对于儒家人生观与人格修养的倡导尤其不遗余力。也正因此，在很多昔日曾受过梁启超的文章鼓动和思想启蒙的年轻人看来，这后期的转变，表现出梁启超思想上的落伍。继梁启超之后成为当时青年领袖的胡适在他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21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的《四十自述》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①

胡适又说：

《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②

但对梁启超晚年思想的转变，胡适却很不以为然。

梁启超1922年为北大哲学社演讲，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胡适这本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而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③

胡适则在当天的日记中，不仅把梁启超此举视为“不通世故”，且对梁启超关于孔子、庄子的见解更加不满，以为“未免太奇特了！”“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④

这种评价并非胡适一时的意气之言。梁启超去世后，胡适

①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二卷，第4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4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③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所拟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写道，“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①可见，认为其后期思想陷于“卫道”的“退境”之中，是胡适对于梁启超的盖棺之论。

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评价梁启超后期的学术活动与成就，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如果说早期的梁启超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最大的特点是“趋新”，那么后期则转向“守旧”，回归儒家传统价值观。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转变，本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各方面对这一转变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主流知识界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大致可以胡适的看法为代表。但在主流观点之外，也不乏见仁见智的不同声音。

我们常说“盖棺论定”。1929年初，梁启超去世后，在北京和上海都曾有过隆重的追悼会哀悼这位一代文化巨子的过世。对于梁启超的一生，其第一阶段追随康有为，参与变法维新；第二个时期借途日本，宣传欧化，鼓吹“新民”，以及第三个时期的追求宪政，再造共和，人们都有比较一致的肯定。但对其一生思想的“屡变”，和晚年著述时期的回归儒家传统倾向，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张孟劬、张东荪兄弟的挽联所谓“言满天下，名满天下”，“知惟《春秋》，罪惟《春秋》”即反映了当时各界对梁启超的评价持有不同的态度。

但在各方所致送的不计其数的挽联中，也有这样两联，对梁启超后期的学术生涯别具“了解的同情”和深长的意味：

^①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第4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维新始，讲学终，毕生诱掖青年，可告无罪；建设难，破坏易，晚岁绝缘政治，别有深心。（诸青来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沈商耆撰）^①

梁启超一生所致力之事业，以政治和学术为两大领域。围绕这两大端，其新闻活动和教育实践亦贯穿于其中，在晚清至民初，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梁启超的思想也是博大精深又复杂多变，不同时代的学者，都会对梁启超的思想有着自己的看法。这样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晚年思想的转变无疑值得关注。我想探讨的，是这种思想的转变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心态下发生的，以及梁启超本人的心路历程。因为这种后期心态的转变，在19、20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身上屡见不鲜。

二

终其一生，梁启超都有着非常明确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期许。

早年的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鼓吹变法，宣传改良；流亡日本时期致力于输入西学，宣传欧化。三十岁之前的重要活动，俱见他自己所写的一篇《三十自述》。在这篇自述中，他把自己的出生和国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一种郑重其事的使命感：

^①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第4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①

若是换了别人，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不免要貶人“大言不惭”之讥，但由梁启超说来，却能既合乎其身份，又显出他独特的个性。年轻时代的梁任公热血沸腾、风发才涌、敏锐好奇，他携种种西方新思想的风雷，对中国旧有的制度文化发起冲击，呼吁改良，甚至倡言革命。他热切地期待着一个“少年中国”的诞生，而他自己，正是要做时代的大变局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是梁启超投身于民国政治的时期。从政的经历，既给了梁启超实现以往政治抱负的机会，也同时让他逐渐看清了，自己并不是一个适宜于政治生活的人。

五四之后，欧游归来，绝缘政治活动，退守书斋，专心于著述讲学的梁启超，其“任世”之心仍未稍变，但此时他的心态却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是欧游途中受到西方学者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是欧游归来后为国内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所刺激。

1917年7月，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颇思在改革币制及整顿金融方面有所作为。但结果事与愿违，无论从积极的改革抑或消极的维持来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颇令梁启超心灰意冷。而因其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引起南方各省的不满，并发起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对立的政局，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222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也是梁启超所始料未及的。年底辞职后，梁启超为摆脱从政失败的苦闷，一方面治碑版之学自遣，一方面潜心于通史之作，著述之勤，以至于呕血。著述之余，还为子女讲授国学源流。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一些同人发起“松社”之议。而松社宗旨，重在读书、养性、敦品、励行。此时，亦有好友力劝梁启超“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摒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袁思亮1918年10月30日《致任公先生书》）^①

1918年12月27日，即梁启超与朋友搭乘日本“横滨丸”启程欧游的前一晚，他们与张东荪、黄群“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②

可见，此时的梁启超，已开始酝酿着职业选择的重要转变，即感觉从政的报国方式虽欲速而不达，此后应改从思想文化领域着手，培植国民元气。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但背后实也包含着几分无奈。此时起意游欧，一个很明显的动机，还是希望向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界取经，开阔眼界，廓清自己内心的困惑。但一年多的欧游经历，在战后欧洲的所见所闻，却促使梁启超在对待东西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向。

在欧洲，他目睹了科学万能迷梦的破产。科学的发展，给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第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